
文學空間視角下的盛中唐寺院 詩歌創作

王雪婷

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

文學空間是由文士創造和開拓而形成的產物，同時也是影響和培養文士生活及其文學作品的客觀載體。唐代寺院這種多樣一體性文學空間的興盛帶動了詩歌創作興致的高漲。作為社交的平臺與觀照的視角，山林寺院這一空間環境滿足了士人的身心需求；以寺院這一特殊場所為中心，包含山水環境、人文景觀、詩僧在內的佛寺文化整體為詩人的創作提供了機緣；寺院生活體驗對詩人的創作及其聯唱體式詩歌的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

關鍵詞：文學空間 寺院 盛中唐 詩人創作

文學空間性研究很大程度地彌補了文學史研究中對同一時代或時期內文學發生、發展和存在狀況的複雜性揭示不夠的情況。文學空間其實可分為兩層基本含義，一是文學內部空間，側重於文本形式構造的空間；二是文學外部空間，即文學家所身處，其文學作品賴以產生並深受其影響的外部環境。本文以文學空間為視角，以盛中唐寺院空間為研究對象，意在通過獨特的視角和對寺院這一特定空間文學的考察，獲取一些對唐代文學的新的認識。文學空間一方面是由文人創造和開拓的產物，另一方面也是影響、培養文士生活及其文學作品的一個客觀載體。寺院作為一種區別於都市空間的環境，使之前困擾士人仕隱分離的矛盾在一定層面上得以解決，兩種生活得以協調融合，使表達寺院題材的文學創作得以興發，也為文學面貌的多樣化創作了條件。

一、寺院文學空間與文士創作

本文所謂的文學空間，準確地說應稱為文學外部空間或文學產生空間。文學外部空間研究是把文學產生發展的外部環境以行政區域、自然分割和歷史傳統為依據，具體到本文，則涉及盛中唐詩歌的創作緣由、本事、氛圍等對文人和文學的滋育及影響。本文以盛中唐¹寺院題材文學為對象，這一階段恰好處於唐代佛寺、僧人數量

1 本文所謂的盛中唐是依據袁行霈的說法，指玄宗開元九年（721）至文宗大和九年（835）這一歷史階段。唐高宗初年，僧人道宣云：「眾僧房、堂，諸俗受用，毀壞損辱，情無所愧」，可見在唐初就有俗人寄寺現象。參見道宣：《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卷下之三，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東京：大正新修大藏經刊行會，1988年），第40冊，頁135。從唐代寺院詩歌的發展狀況來看，唐初至玄宗先天元年（712），文人與寺院的關係還沒有非常密切。縱觀《全唐詩》及《全唐詩補編》等書，當時的詩人除了宋之問、沈佺期，其他詩人如王勃、駱賓王等人所創作的寺院題材詩歌數量很少，基本不超過四首。玄宗開元元年（713）至代宗永泰二年（766），隨著唐朝國力的強盛，佛教也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全國各地寺院數量增多，文人遊寺的習尚漸漸興起。從現存文獻看，著名詩人李白、杜甫、孟浩然、王維、岑參等人皆創作過大量寺院題材詩歌。代宗大曆元年（766）至文宗大和九年（835）是唐代寺院題材詩歌發展的黃金時期。這一方面是因為遊寺的習尚逐漸升溫，另一方面也與當時的社會現實及文人的心態息息相關。安史之亂後，唐朝由

最為穩定的一百多年間。當時文學以詩歌為主，具有短小靈活的特點，文本內部的空間性並不顯著；而這些詩歌往往是在各種活動、場所中現場即興完成，對外部環境有很大的依賴性。

劉勰在《文心雕龍·神思》云：「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² 從環境對作家創作情緒的激發角度立論，實際上和文學作品的產生與空間環境的關係這一視角在思路上是相似的。鍾嶸在《詩品》序云：

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娥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³

也是從外部環境和人生處境對主體創作心態的影響角度立論。鍾嶸所指出的影響詩人心態的因素，其實更接近於空間環境的特徵。可以說都一定程度上觸及到了文學產生深受空間環境影響這一問題。

中國古代文士的生活狀態和生活環境構成則是我們考察總結文學空間的主要依據。中國古代文人的人生追求可以說基本上都是以仕途追求和建立政治功業為目標。在這樣的大目標之下，他們的人生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和三種生活類型：一、仕途準備階段，這期間主要是成長讀書生活；二、在仕為官階段，這期間主要是仕途生活；三、致仕退居階段，這期間主要是閒逸生活。而在這整個過程

盛轉衰，殘酷的現實使文人的入仕熱情退去，很多人開始轉向佛教，轉向漫遊寺院追尋內心的解脫。文人遊寺持續到了晚唐，這種風尚到了武宗滅佛戛然而止。武宗滅佛後一年而薨，宣宗繼位便重修寺院。但文人遊寺的熱情卻開始慢慢冷卻。故本文旨在探討盛中唐時期，寺院這一特殊空間為詩人創作提供的機緣。

2 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頁493-494。

3 鍾嶸著，曹旭集注：《詩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頁47。

文學空間性研究很大程度地彌補了文學史研究中對同一時代或時期內文學發生、發展和存在狀況的複雜性揭示不夠的情況。文學空間其實可分為兩層基本含義，一是文學內部空間，側重於文本形式構造的空間；二是文學外部空間，即文學家所身處，其文學作品賴以產生並深受其影響的外部環境。本文以文學空間為視角，以盛中唐寺院空間為研究對象，意在通過獨特的視角和對寺院這一特定空間文學的考察，獲取一些對唐代文學的新的認識。文學空間一方面是由文人創造和開拓的產物，另一方面也是影響、培養文士生活及其文學作品的一個客觀載體。寺院作為一種區別於都市空間的環境，使之前困擾士人仕隱分離的矛盾在一定層面上得以解決，兩種生活得以協調融合，使表達寺院題材的文學創作得以興發，也為文學面貌的多樣化創作了條件。

一、寺院文學空間與文士創作

本文所謂的文學空間，準確地說應稱為文學外部空間或文學產生空間。文學外部空間研究是把文學產生發展的外部環境以行政區域、自然分割和歷史傳統為依據，具體到本文，則涉及盛中唐詩歌的創作緣由、本事、氛圍等對文人和文學的滋育及影響。本文以盛中唐¹寺院題材文學為對象，這一階段恰好處於唐代佛寺、僧人數量

1 本文所謂的盛中唐是依據袁行霈的說法，指玄宗開元九年（721）至文宗大和九年（835）這一歷史階段。唐高宗初年，僧人道宣云：「眾僧房、堂，諸俗受用，毀壞損辱，情無所愧」，可見在唐初就有俗人寄寺現象。參見道宣：《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卷下之三，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東京：大正新修大藏經刊行會，1988年），第40冊，頁135。從唐代寺院詩歌的發展狀況來看，唐初至玄宗先天元年（712），文人與寺院的關係還沒有非常密切。縱觀《全唐詩》及《全唐詩補編》等書，當時的詩人除了宋之問、沈佺期，其他詩人如王勃、駱賓王等人所創作的寺院題材詩歌數量很少，基本不超過四首。玄宗開元元年（713）至代宗永泰二年（766），隨著唐朝國力的強盛，佛教也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全國各地寺院數量增多，文人遊寺的習尚漸漸興起。從現存文獻看，著名詩人李白、杜甫、孟浩然、王維、岑參等人皆創作過大量寺院題材詩歌。代宗大曆元年（766）至文宗大和九年（835）是唐代寺院題材詩歌發展的黃金時期。這一方面是因為遊寺的習尚逐漸升溫，另一方面也與當時的社會現實及文人的心態息息相關。安史之亂後，唐朝由

最為穩定的一百多年間。當時文學以詩歌為主，具有短小靈活的特點，文本內部的空間性並不顯著；而這些詩歌往往是在各種活動、場所中現場即興完成，對外部環境有很大的依賴性。

劉勰在《文心雕龍·神思》云：「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² 從環境對作家創作情緒的激發角度立論，實際上和文學作品的產生與空間環境的關係這一視角在思路上是相似的。鍾嶸在《詩品》序云：

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娥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³

也是從外部環境和人生處境對主體創作心態的影響角度立論。鍾嶸所指出的影響詩人心態的因素，其實更接近於空間環境的特徵。可以說都一定程度上觸及到了文學產生深受空間環境影響這一問題。

中國古代文士的生活狀態和生活環境構成則是我們考察總結文學空間的主要依據。中國古代文人的人生追求可以說基本上都是以仕途追求和建立政治功業為目標。在這樣的大目標之下，他們的人生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和三種生活類型：一、仕途準備階段，這期間主要是成長讀書生活；二、在仕為官階段，這期間主要是仕途生活；三、致仕退居階段，這期間主要是閒逸生活。而在這整個過程

盛轉衰，殘酷的現實使文人的入仕熱情退去，很多人開始轉向佛教，轉向漫遊寺院追尋內心的解脫。文人遊寺持續到了晚唐，這種風尚到了武宗滅佛戛然而止。武宗滅佛後一年而薨，宣宗繼位便重修寺院。但文人遊寺的熱情卻開始慢慢冷卻。故本文旨在探討盛中唐時期，寺院這一特殊空間為詩人創作提供的機緣。

2 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頁493-494。

3 鍾嶸著，曹旭集注：《詩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頁47。

中，寺院幾乎存在於每個環節：應考之前士子多在寺院習業，應考之時多寄宿寺院；在仕為官之時擁有一定的閒暇時間，會有斷續的隱逸和漫遊山林寺院之風；致仕退居之時會選擇隱逸於山林寺院。寺院空間也就因此與發生於其中的文學活動和文學創作密切相關。

西方學者列斐伏爾（Lefebvre）、⁴ 索亞（Edward W. Soja）⁵ 也強調空間內涵具有極度豐富性和無限容納性，他們關於空間生產的看法啟示我們考察文學與空間環境的關係時，不能局限於僅僅關注自然環境、政治環境、歷史文化傳統等因素，而是應該以無限廣闊的眼光去發掘空間構成中的諸多要素。空間生產的理論，於盛中唐文學空間的特點也有一些契合性。比如寺院文化真正產生較大影響是在盛中唐時期，這是唐代文士在生活形態發生轉變後才發現並走進其中，「創造」出的一個文學空間。唐代，尤其是盛中唐時期，詩人遊居寺院、交接僧人的風氣極為濃厚，乃至「山寺每遊多寄宿」、「交遊一半在僧中」。據筆者統計，《全唐詩》留下了三千多首寺院題材詩歌，涉及作者近四百人。以盛中唐時期存詩來看，至少有一百五十餘位詩人曾遊寺訪僧，留下了一千四百多首相關題材詩歌。所歷寺院額名可考者近三百處，另有蘭若、招提等不可確定者多處，相當於當時僧寺數量的十分之一。唐代詩人如此密集地到訪寺院、交遊寺僧，在問佛學道的過程中受到感染，有所感悟，產生了吟詠或贈答之作，而使寺院具有了文學空間的功能；同時，寺院和僧人滲入到詩人的日常生活之中，進而對他們的詩歌創作產生作用。

對於作為影響文學主體及其文學作品產生的外部環境的文學空間，本文作這樣的界定：是指文士所身處的、影響其創作思想、心態、情緒的某一具有相對獨立性、整體性的外部環境。它包括有形的物態景觀，如自然和人造景觀、歷史人文景觀；包括長期積澱而

4 H.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 Nicholson-Smith (Oxford: Blackwell, 1991).

5 愛德華·W·索亞（Edward W. Soja）著，陸揚等譯：《第三空間：去往洛杉磯和其他真實和想像地方的旅程》（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

成的無形的歷史傳統和風習；也包括無形無跡卻深刻作用於創作主體的一種現場氛圍；還包括創作主體之外與之同時存在的其他主體及其關係。現分述之。

二、寺院物態景觀與風習對詩人興思的激發

人口稠密的都市，是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所在，因此也常是寺院聚集的地方。盛唐之世，坐落於通都大邑的寺院密度要遠高於偏遠地區。⁶ 但由於受到中國文化中山水審美觀念的影響，即使處於通都大邑的寺院，也大多依山傍水；缺乏先天山水環境者，便往往通過後天的園林化手段來彌補其不足。寺院選址的山林以及寺院布局所呈現的園林化傾向是漢傳佛教寺院建築的獨特風格，這一特徵在唐代寺院中表現得尤為突出。而在江南地區，由於地理環境上所具有的天然優勢，更吸引了眾多的高僧駐錫，使得名剎大寺遍布於江南的名山聖水。故本文探討的是文學寺院空間的共通性，而不過於關注寺院間的差異性。

山水因佛教增添了文化內蘊，佛教則因山水形勝而吸引了更多普通民眾的注意。於是，勝景與佛教相得益彰，佛寺空間也就成為了具有人文與自然情趣的勝地。同時，也正是佛寺的山水景觀之美以及唐代文人對佛寺的這種體認，唐代的佛寺空間才與詩人的創作有了密切的關聯。中唐詩人錢起〈題精舍寺〉云：

勝景不易遇，入門神頓清。房房占山色，處處分泉聲。詩思竹間得，道心松下生。何時來此地，擺落世間情。⁷

晚唐詩人周繇〈甘露寺北軒〉曰：

6 據張弓《漢唐佛寺文化史》統計：《方誌》顯示的漢唐 5335 所佛寺，分布唐代 234 州、809 縣，佔唐州（328）的 71.34%，唐縣（1573）的 51.43%。張弓：《漢唐佛寺文化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年），頁 147。

7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卷二三七，頁 2621。

中，寺院幾乎存在於每個環節：應考之前士子多在寺院習業，應考之時多寄宿寺院；在仕為官之時擁有一定的閒暇時間，會有斷續的隱逸和漫遊山林寺院之風；致仕退居之時會選擇隱逸於山林寺院。寺院空間也就因此與發生於其中的文學活動和文學創作密切相關。

西方學者列斐伏爾（Lefebvre）、⁴ 索亞（Edward W. Soja）⁵ 也強調空間內涵具有極度豐富性和無限容納性，他們關於空間生產的看法啟示我們考察文學與空間環境的關係時，不能局限於僅僅關注自然環境、政治環境、歷史文化傳統等因素，而是應該以無限廣闊的眼光去發掘空間構成中的諸多要素。空間生產的理論，於盛中唐文學空間的特點也有一些契合性。比如寺院文化真正產生較大影響是在盛中唐時期，這是唐代文士在生活形態發生轉變後才發現並走進其中，「創造」出的一個文學空間。唐代，尤其是盛中唐時期，詩人遊居寺院、交接僧人的風氣極為濃厚，乃至「山寺每遊多寄宿」、「交遊一半在僧中」。據筆者統計，《全唐詩》留下了三千多首寺院題材詩歌，涉及作者近四百人。以盛中唐時期存詩來看，至少有一百五十餘位詩人曾遊寺訪僧，留下了一千四百多首相關題材詩歌。所歷寺院額名可考者近三百處，另有蘭若、招提等不可確定者多處，相當於當時僧寺數量的十分之一。唐代詩人如此密集地到訪寺院、交遊寺僧，在問佛學道的過程中受到感染，有所感悟，產生了吟詠或贈答之作，而使寺院具有了文學空間的功能；同時，寺院和僧人滲入到詩人的日常生活之中，進而對他們的詩歌創作產生作用。

對於作為影響文學主體及其文學作品產生的外部環境的文學空間，本文作這樣的界定：是指文士所身處的、影響其創作思想、心態、情緒的某一具有相對獨立性、整體性的外部環境。它包括有形的物態景觀，如自然和人造景觀、歷史人文景觀；包括長期積澱而

4 H.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 Nicholson-Smith (Oxford: Blackwell, 1991).

5 愛德華·W·索亞（Edward W. Soja）著，陸揚等譯：《第三空間：去往洛杉磯和其他真實和想像地方的旅程》（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

成的無形的歷史傳統和風習；也包括無形無跡卻深刻作用於創作主體的一種現場氛圍；還包括創作主體之外與之同時存在的其他主體及其關係。現分述之。

二、寺院物態景觀與風習對詩人興思的激發

人口稠密的都市，是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所在，因此也常是寺院聚集的地方。盛唐之世，坐落於通都大邑的寺院密度要遠高於偏遠地區。⁶ 但由於受到中國文化中山水審美觀念的影響，即使處於通都大邑的寺院，也大多依山傍水；缺乏先天山水環境者，便往往通過後天的園林化手段來彌補其不足。寺院選址的山林以及寺院布局所呈現的園林化傾向是漢傳佛教寺院建築的獨特風格，這一特徵在唐代寺院中表現得尤為突出。而在江南地區，由於地理環境上所具有的天然優勢，更吸引了眾多的高僧駐錫，使得名剎大寺遍布於江南的名山聖水。故本文探討的是文學寺院空間的共通性，而不過於關注寺院間的差異性。

山水因佛教增添了文化內蘊，佛教則因山水形勝而吸引了更多普通民眾的注意。於是，勝景與佛教相得益彰，佛寺空間也就成為了具有人文與自然情趣的勝地。同時，也正是佛寺的山水景觀之美以及唐代文人對佛寺的這種體認，唐代的佛寺空間才與詩人的創作有了密切的關聯。中唐詩人錢起〈題精舍寺〉云：

勝景不易遇，入門神頓清。房房占山色，處處分泉聲。詩思竹間得，道心松下生。何時來此地，擺落世間情。⁷

晚唐詩人周繇〈甘露寺北軒〉曰：

6 據張弓《漢唐佛寺文化史》統計：《方誌》顯示的漢唐 5335 所佛寺，分布唐代 234 州、809 縣，佔唐州（328）的 71.34%，唐縣（1573）的 51.43%。張弓：《漢唐佛寺文化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年），頁 147。

7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卷二三七，頁 2621。

曉色宜閒望，山風遠益清。白雲連晉閣，碧樹盡燕城。少靜沙痕出，煙消野火平。最堪佳此境，為我長詩情。⁸

「詩思竹間得，道心松下生」、「最堪佳此境，為我長詩情」兩句明確地指出了寺院自然環境對詩人詩興的激發作用，是唐代詩人中很有代表性的觀點。其實，不止自然環境、寺院內的人工景觀、人文景觀也都充當了促發詩人創作衝動的觸媒。

自然風景對於中國古典詩歌的創作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特別是六朝以後，伴隨著中國文人對自然山水審美價值的發現，不僅詩歌創作中自然風景的描寫分量越來越大，而且自然山水也逐漸成為詩人創作感物起興、引發詩思的源泉。劉勰曾云：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若乃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繁。⁹

唐代詩人繼承了六朝以來藉山水景物抒情寫懷的傳統，特別注意景物在詩歌創作中的作用。一方面山水景物是作家寄託情懷的載體，另一方面它也往往是作家靈感產生的觸媒。由於唐代詩人特別重視感賦詩，興又常常由物引發，因此，當唐代詩人在寺院空間中遊覽時，由於其中多有與山水景物相聯繫的景觀，它自然也就成為詩人感興賦詩的最佳場所。

寺院空間內的自然景物對詩人創作的意義，可以從兩方面來考察。首先是寺院周圍的自然景觀對詩人創作的影響。就唐人現存的題詠寺院之作來看，多數詩歌所寫的都是自然景觀十分出色的寺

8 同上注，卷六三七，頁 7342。

9 劉勰著，周振甫註：《文心雕龍注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頁 493-494。

院，當詩人遊覽這類寺院時，他們所關注的也常是寺院周圍的景觀，並由此引發他們登臨觀賞的感受，王維的〈過香積寺〉即是這樣的詩作。詩云：

不知香積寺，數里入雲峰。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鐘。
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禪制毒龍。¹⁰

這首詩在寫法上並未從香積寺本身著筆，開頭一句「不知香積寺，數里入雲峰」，即點明詩人是遠在寺院之外。「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鐘。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兩聯，寫其因聞鐘聲而知寺，並寫所見寺院周圍清幽之景，最後一句「薄暮空潭曲，安禪制毒龍」，轉寫因寺院的環境之幽，想到寺內僧人克制妄想的禪定生活。從全詩可以看出，詩歌的重心在於寫香積寺周圍景色之幽美，所以近人俞陛雲即批評此詩云：「此詠寺外幽景，皆不從本寺落筆。」¹¹白居易的〈遊悟真寺〉長達百韻，以移步換形的筆法，從出遊寫至山頂寺院，將沿途所見，備寫無餘。《唐宋詩醇》評曰：「洋洋灑灑，一氣讀去，幾於千巖競秀、萬壑爭流，目不給賞矣。」¹²

如果說寺院周圍之景引發詩人的遊興詩情並提供了寫詩的素材，那麼處於山水環境中的寺院，則又常常成為詩人觀景的最佳空間視點。佛教徒在創寺之初，未必會有將寺院作為觀景之處的考慮，但由於寺院多處高山，加之寺院與周圍環境渾然一體，因此當寺院建成後，也就成為便於觀賞的處所。地處杭州西子湖畔的靈隱寺即是這樣的一個例子。初唐詩人宋之問的〈靈隱寺〉詩，即寫由登寺所見之勝景，云：「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由於詩中這幾句寫景極為出色，因而還由此詩引出了

10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增訂本）》，卷一二六，頁1274。

11 俞陛雲：《詩境淺說》（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頁10。

12 愛新覺羅·弘曆：《御選唐宋詩醇》，卷二一，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第1448冊，頁437。

曉色宜閒望，山風遠益清。白雲連晉閣，碧樹盡燕城。少靜沙痕出，煙消野火平。最堪佳此境，為我長詩情。⁸

「詩思竹間得，道心松下生」、「最堪佳此境，為我長詩情」兩句明確地指出了寺院自然環境對詩人詩興的激發作用，是唐代詩人中很有代表性的觀點。其實，不止自然環境、寺院內的人工景觀、人文景觀也都充當了促發詩人創作衝動的觸媒。

自然風景對於中國古典詩歌的創作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特別是六朝以後，伴隨著中國文人對自然山水審美價值的發現，不僅詩歌創作中自然風景的描寫分量越來越大，而且自然山水也逐漸成為詩人創作感物起興、引發詩思的源泉。劉勰曾云：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若乃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繁。⁹

唐代詩人繼承了六朝以來藉山水景物抒情寫懷的傳統，特別注意景物在詩歌創作中的作用。一方面山水景物是作家寄託情懷的載體，另一方面它也往往是作家靈感產生的觸媒。由於唐代詩人特別重視感賦詩，興又常常由物引發，因此，當唐代詩人在寺院空間中遊覽時，由於其中多有與山水景物相聯繫的景觀，它自然也就成為詩人感興賦詩的最佳場所。

寺院空間內的自然景物對詩人創作的意義，可以從兩方面來考察。首先是寺院周圍的自然景觀對詩人創作的影響。就唐人現存的題詠寺院之作來看，多數詩歌所寫的都是自然景觀十分出色的寺

8 同上注，卷六三七，頁 7342。

9 劉勰著，周振甫註：《文心雕龍注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頁 493-494。

院，當詩人遊覽這類寺院時，他們所關注的也常是寺院周圍的景觀，並由此引發他們登臨觀賞的感受，王維的〈過香積寺〉即是這樣的詩作。詩云：

不知香積寺，數里入雲峰。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鐘。
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禪制毒龍。¹⁰

這首詩在寫法上並未從香積寺本身著筆，開頭一句「不知香積寺，數里入雲峰」，即點明詩人是遠在寺院之外。「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鐘。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兩聯，寫其因聞鐘聲而知寺，並寫所見寺院周圍清幽之景，最後一句「薄暮空潭曲，安禪制毒龍」，轉寫因寺院的環境之幽，想到寺內僧人克制妄想的禪定生活。從全詩可以看出，詩歌的重心在於寫香積寺周圍景色之幽美，所以近人俞陸雲即批評此詩云：「此詠寺外幽景，皆不從本寺落筆。」¹¹白居易的〈遊悟真寺〉長達百韻，以移步換形的筆法，從出遊寫至山頂寺院，將沿途所見，備寫無餘。《唐宋詩醇》評曰：「洋洋灑灑，一氣讀去，幾於千巖競秀、萬壑爭流，目不給賞矣。」¹²

如果說寺院周圍之景引發詩人的遊興詩情並提供了寫詩的素材，那麼處於山水環境中的寺院，則又常常成為詩人觀景的最佳空間視點。佛教徒在創寺之初，未必會有將寺院作為觀景之處的考慮，但由於寺院多處高山，加之寺院與周圍環境渾然一體，因此當寺院建成後，也就成為便於觀賞的處所。地處杭州西子湖畔的靈隱寺即是這樣的一個例子。初唐詩人宋之問的〈靈隱寺〉詩，即寫由登寺所見之勝景，云：「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由於詩中這幾句寫景極為出色，因而還由此詩引出了

10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增訂本）》，卷一二六，頁1274。

11 俞陸雲：《詩境淺說》（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頁10。

12 愛新覺羅·弘曆：《御選唐宋詩醇》，卷二一，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第1448冊，頁437。

一則詩壇佳話。¹³

在其他詩人的作品中，也常可見到登寺觀覽之作。王維〈別弟縉後登青龍寺望藍田山〉從寺內俯瞰藍田山景，「遠樹蔽行人，長天隱秋塞」¹⁴句極為雄渾；郎士元〈柏林寺南望〉：「溪上遙聞精舍鐘，泊舟微徑度深松。青山霽後雲猶在，畫出東南四五峰。」¹⁵寺院裡悠揚的鐘聲，吸引了詩人的注意，詩人因而捨舟登岸，造訪峰上山寺，當他由寺而南望時，恰逢雨後初霽，山巒淡出於雲霧，美景畢現於眼前，於是，便有了這首融詩情與畫意於一體的詩篇。餘如韋應物〈同德寺閣集眺〉，白居易〈登龍昌上寺望江南山，懷錢舍人〉、〈菩提寺上方晚望香山寺，寄舒員外〉等，均為異曲同工之妙。更為典型的是，總持寺有高閣，孟浩然、岑參、耿漳等詩人都有登總持寺閣臨眺之作，鮮明地體現了寺院作為景觀平臺令詩人睹景起興、引發創作的效果。

寺院的景物，除了其周圍的自然景物之外，從另一方面看，對詩人創作產生影響的還有寺院的人造景觀，以亭臺樓閣的營造為主，洗心亭即是一例。劉禹錫〈洗心亭記〉載：

天下聞寺數十輩，而吉祥尤彰彰。躡名山，俯大江，
荆吳雲水交錯如繡。始余以不到為恨，今方弭所恨而充所
望焉。既周覽讚嘆，於竹石間最奇處得新亭。形焉如巧人
畫鰲背上物，即之四顧，遠邇細大，雜然陳乎前，引入目

13 孟榮《本事詩·徵異第五》云：宋考功以事累貶黜。後放還，至江南。遊靈隱寺，夜月極明，長廊吟行，且為詩曰：「鷲嶺鬱蒼嶽，龍宮隱寂寥。」第二聯搜奇思，終不如意。有老僧點長明燈，坐大禪牀，問曰：「少年夜夕久不寐，而吟諷甚苦，何邪？」之問答曰：「弟子業詩，適偶欲題此寺，而興思不屬。」僧曰：「試吟上聯。」即吟與聽之，再三吟諷，因曰：「何不云『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潮』？」之問愕然，訝其適麗。又續終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剝木取泉遙。霜薄花更發，冰輕葉未凋。待入天台路，看余待入天台路，看余餘度石橋度石橋。」僧所贈句，乃為一篇之警策。遲明更訪之，則不復見矣。寺僧有知者，曰：「此駱賓王也。」見丁福保：《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上冊，頁17-18。

14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增訂本）》，卷一二五，頁1245。

15 同上注，卷二四八，頁2778。

去，求瞬不得。徵其經始，曰僧義然。嘯侶為工，即山求材。槩高孕虛，萬景坌來。詞人處之，思出常格；禪子處之，遇境而寂；憂人處之，百慮冰息。鳥思猿情，繞梁歷榭。月來松間，彫縷軒墀。石列筍簾，藤蟠蛟螭。修竹萬竿，夏含涼颼。斯亭之實錄云爾。然上人舉如意挹我曰：「既志之，盍名之以行乎遠夫！」余始以是亭園視無不適，始適乎目而方寸為清，故名洗心。長慶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劉某記。¹⁶

所謂「詞人處之，思出常格」，可見這一人造景觀空間對文人創作詩思的影響。而唐代地方官員在寺院興建亭臺樓閣，則更不鮮見。白居易〈冷泉亭記〉云：

東南山水，餘杭郡為最。就郡言，靈隱寺為尤。由寺觀言，冷泉亭為甲。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而撮奇得要，地搜勝槩，物無遁形。

春之日，吾愛其草薰薰，木欣欣，可以導和納粹，暢人血氣。夏之夜，吾愛其泉淅淅，風泠泠，可以蠲煩析醒，起人心情。山樹為蓋，巖石為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坐而翫之者，可濯足於牀下；臥而狎之者，可垂釣於枕上。矧又潺湲潔澈，粹冷柔滑。若俗士，若道人，眼耳之塵，心舌之垢，不待盥滌，見輒除去。潛利陰益，可勝言哉！斯所以最餘杭而甲靈隱也。

杭自郡城抵四封，叢山複湖，易為形勝。先是領郡者，有相里君造虛白亭，有韓僕射舉作候仙亭，有裴庶子棠棣作觀風亭，有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萼最後作此亭。於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謂佳境殫矣，能事畢矣。¹⁷

16 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卷六〇六，頁6125-6126。

17 同上注，卷六七六，頁6910-6911。

一則詩壇佳話。¹³

在其他詩人的作品中，也常可見到登寺觀覽之作。王維〈別弟縉後登青龍寺望藍田山〉從寺內俯瞰藍田山景，「遠樹蔽行人，長天隱秋塞」¹⁴句極為雄渾；郎士元〈柏林寺南望〉：「溪上遙聞精舍鐘，泊舟微徑度深松。青山霽後雲猶在，畫出東南四五峰。」¹⁵寺院裡悠揚的鐘聲，吸引了詩人的注意，詩人因而捨舟登岸，造訪峰上山寺，當他由寺而南望時，恰逢雨後初霽，山巒淡出於雲霧，美景畢現於眼前，於是，便有了這首融詩情與畫意於一體的詩篇。餘如韋應物〈同德寺閣集眺〉，白居易〈登龍昌上寺望江南山，懷錢舍人〉、〈菩提寺上方晚望香山寺，寄舒員外〉等，均為異曲同工之妙。更為典型的是，總持寺有高閣，孟浩然、岑參、耿漳等詩人都有登總持寺閣臨眺之作，鮮明地體現了寺院作為景觀平臺令詩人睹景起興、引發創作的效果。

寺院的景物，除了其周圍的自然景物之外，從另一方面看，對詩人創作產生影響的還有寺院的人造景觀，以亭臺樓閣的營造為主，洗心亭即是一例。劉禹錫〈洗心亭記〉載：

天下聞寺數十輩，而吉祥尤彰彰。躡名山，俯大江，
荆吳雲水交錯如繡。始余以不到為恨，今方弭所恨而充所
望焉。既周覽讚嘆，於竹石間最奇處得新亭。形焉如巧人
畫鰲背上物，即之四顧，遠邇細大，雜然陳乎前，引入目

13 孟榮《本事詩·徵異第五》云：宋考功以事累貶黜。後放還，至江南。遊靈隱寺，夜月極明，長廊吟行，且為詩曰：「鷲嶺鬱蒼嶽，龍宮隱寂寥。」第二聯搜奇思，終不如意。有老僧點長明燈，坐大禪牀，問曰：「少年夜夕久不寐，而吟諷甚苦，何邪？」之問答曰：「弟子業詩，適偶欲題此寺，而興思不屬。」僧曰：「試吟上聯。」即吟與聽之，再三吟諷，因曰：「何不云『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潮』？」之問愕然，訝其適麗。又續終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剝木取泉遙。霜薄花更發，冰輕葉未凋。待入天台路，看余待入天台路，看余餘度石橋度石橋。」僧所贈句，乃為一篇之警策。遲明更訪之，則不復見矣。寺僧有知者，曰：「此駱賓王也。」見丁福保：《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上冊，頁17-18。

14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增訂本）》，卷一二五，頁1245。

15 同上注，卷二四八，頁2778。

去，求瞬不得。徵其經始，曰僧義然。嘯侶為工，即山求材。槩高孕虛，萬景坌來。詞人處之，思出常格；禪子處之，遇境而寂；憂人處之，百慮冰息。鳥思猿情，繞梁歷榭。月來松間，彫縷軒墀。石列筍簾，藤蟠蛟螭。修竹萬竿，夏含涼颺。斯亭之實錄云爾。然上人舉如意挹我曰：「既志之，盍名之以行乎遠夫！」余始以是亭園視無不適，始適乎目而方寸為清，故名洗心。長慶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劉某記。¹⁶

所謂「詞人處之，思出常格」，可見這一人造景觀空間對文人創作詩思的影響。而唐代地方官員在寺院興建亭臺樓閣，則更不鮮見。白居易〈冷泉亭記〉云：

東南山水，餘杭郡為最。就郡言，靈隱寺為尤。由寺觀言，冷泉亭為甲。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而撮奇得要，地搜勝槩，物無遁形。

春之日，吾愛其草薰薰，木欣欣，可以導和納粹，暢人血氣。夏之夜，吾愛其泉淅淅，風泠泠，可以蠲煩析醒，起人心情。山樹為蓋，巖石為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坐而翫之者，可濯足於牀下；臥而狎之者，可垂釣於枕上。矧又潺湲潔澈，粹冷柔滑。若俗士，若道人，眼耳之塵，心舌之垢，不待盥滌，見輒除去。潛利陰益，可勝言哉！斯所以最餘杭而甲靈隱也。

杭自郡城抵四封，叢山複湖，易為形勝。先是領郡者，有相里君造虛白亭，有韓僕射舉作候仙亭，有裴庶子棠棣作觀風亭，有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萼最後作此亭。於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謂佳境殫矣，能事畢矣。¹⁷

16 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卷六〇六，頁6125-6126。

17 同上注，卷六七六，頁6910-6911。

柳宗元在被貶永州時，也曾於法華寺旁建亭，寫有〈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文記其事。¹⁸ 此外，顏真卿刺湖州時於妙喜寺也置三癸亭，顧非熊〈題永福寺臨淮亭〉中之臨淮亭，據詩題下注，也為司馬復所置。¹⁹ 江山無限景，都聚一亭中」，當詩人遊覽寺院寫詩時，這些亭臺樓閣，也就成為詩人觀賞景物的最佳視點。

唐代寺院多有壁畫、題名和題壁詩，這些由當時風習而遺留下來的人文景觀亦足以引人駐足，使之發興。唐代詩人喜歡壁畫，由此引發而創作的觀畫類作品不在少數。有的從佛教題材的畫作中領悟佛法教義，如張說〈灑湖山寺〉云：「楚老遊山寺，提攜觀畫壁。揚袂指辟支，睜眄相鬥鬪。險哉透撞兒，千金賭一擲。成敗身自受，傍人那歎息。」²⁰ 而山水壁畫往往給他們帶來更多的審美愉悅，唐詩中多有題寺院山水壁畫之作：

連山畫出映禪扉，粉壁香筵滿翠微。坐來爐氣紫空散，共指晴雲向嶺歸。

——錢起〈題禮上人壁畫山水〉²¹

鏡中真僧白道芬，不服朱審李將軍。淥汗平鋪洞庭水，筆頭點出蒼梧雲。且看八月十五夜，月下看山盡如畫。

——顧況〈嵇山道芬上人畫山水歌〉²²

朱審偏能視夕嵐，洞邊深墨寫秋潭。與君一顧西牆畫，從此看山不向南。

——柳公權〈題朱審寺壁山水畫〉²³

題寺院壁畫成為唐代詩歌中的一類題材，壁畫迥出尋常的奇異風格甚至深刻影響到中晚唐以奇怪為美的詩風。陳允吉指出：有唐一代

18 同上注，卷五八一，頁 5867。

19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增訂本）》，卷五〇九，頁 5830。

20 同上注，卷八六，頁 929。

21 同上注，卷二二九，頁 2679。

22 同上注，卷二六五，頁 2939。

23 同上注，卷四七九，頁 5484-5485。

高度發展的寺廟壁畫，其煥然的藝術成就和詭怪的造型特點，曾廣泛而縱深地影響著當時人們的精神生活，在唐代整個文藝領域引起一種新的變化。²⁴

唐代寺院空間中的寺壁廊柱等處多有題詩，後來的詩人目睹前賢之作，這一風氣也自然會引發他們的創作衝動。許渾的〈覽故人題僧院詩〉即是這樣的詩作。還有些詩人在若干年後舊地重遊時，看到自己前時舊作不禁感慨萬分，興起重題。《唐摭言》載：

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昭寺木蘭院，隨僧齋冷。諸僧厭怠，播至，已飯矣。後二紀，播自重位出鎮是邦，因訪舊遊，向之題已皆碧紗幕其上。播繼以二絕句曰：「二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修。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²⁵

竇群〈重遊惠山寺記〉云：

元和二年五月三日，重遊此寺，獨覽舊題，二十年矣。當時三人，皆登諫列，朱遐景方詣行車，王晦伯尋卒郎署，余自西掖累遷外臺，復此躊躇，吁嗟存歿。朱拾遺詩云：「歲月人間促，煙霞此地多。殷勤竹林寺，更得幾回過。」可謂得詩人之思也。因命題壁，以誌所懷。²⁶

劉禹錫曾在伏毒寺題詩，後來重遊時即有「成篇題舊寺」²⁷。

24 陳允吉：〈論唐代寺廟壁畫對韓愈詩歌的影響〉，《復旦學報》1983年第1期，頁79。

25 王定保：《唐摭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頁73。

26 董誥等編：《全唐文》，卷六一二，頁6185。

27 劉禹錫有〈貞元中侍郎舅氏牧華州時余再忝科第前後由華觀謁陪登伏毒寺屢焉亦曾賦詩題于梁棟今典馮翊暇日登樓南望三峰浩然生思追想昔年之事因成篇題舊寺〉詩，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增訂本）》，卷三五八，頁4042。

柳宗元在被貶永州時，也曾於法華寺旁建亭，寫有〈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文記其事。¹⁸ 此外，顏真卿刺湖州時於妙喜寺也置三癸亭，顧非熊〈題永福寺臨淮亭〉中之臨淮亭，據詩題下注，也為司馬復所置。¹⁹ 江山無限景，都聚一亭中，當詩人遊覽寺院寫詩時，這些亭臺樓閣，也就成為詩人觀賞景物的最佳視點。

唐代寺院多有壁畫、題名和題壁詩，這些由當時風習而遺留下來的人文景觀亦足以引人駐足，使之發興。唐代詩人喜歡壁畫，由此引發而創作的觀畫類作品不在少數。有的從佛教題材的畫作中領悟佛法教義，如張說〈灑湖山寺〉云：「楚老遊山寺，提攜觀畫壁。揚袂指辟支，睜眄相鬥鬪。險哉透撞兒，千金賭一擲。成敗身自受，傍人那歎息。」²⁰ 而山水壁畫往往給他們帶來更多的審美愉悅，唐詩中多有題寺院山水壁畫之作：

連山畫出映禪扉，粉壁香筵滿翠微。坐來爐氣紫空散，共指晴雲向嶺歸。

——錢起〈題禮上人壁畫山水〉²¹

鏡中真僧白道芬，不服朱審李將軍。淥汗平鋪洞庭水，筆頭點出蒼梧雲。且看八月十五夜，月下看山盡如畫。

——顧況〈嵇山道芬上人畫山水歌〉²²

朱審偏能視夕嵐，洞邊深墨寫秋潭。與君一顧西牆畫，從此看山不向南。

——柳公權〈題朱審寺壁山水畫〉²³

題寺院壁畫成為唐代詩歌中的一類題材，壁畫迥出尋常的奇異風格甚至深刻影響到中晚唐以奇怪為美的詩風。陳允吉指出：有唐一代

18 同上注，卷五八一，頁 5867。

19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增訂本）》，卷五〇九，頁 5830。

20 同上注，卷八六，頁 929。

21 同上注，卷二二九，頁 2679。

22 同上注，卷二六五，頁 2939。

23 同上注，卷四七九，頁 5484-5485。

高度發展的寺廟壁畫，其煥然的藝術成就和詭怪的造型特點，曾廣泛而縱深地影響著當時人們的精神生活，在唐代整個文藝領域引起一種新的變化。²⁴

唐代寺院空間中的寺壁廊柱等處多有題詩，後來的詩人目睹前賢之作，這一風氣也自然會引發他們的創作衝動。許渾的〈覽故人題僧院詩〉即是這樣的詩作。還有些詩人在若干年後舊地重遊時，看到自己前時舊作不禁感慨萬分，興起重題。《唐摭言》載：

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昭寺木蘭院，隨僧齋冷。諸僧厭怠，播至，已飯矣。後二紀，播自重位出鎮是邦，因訪舊遊，向之題已皆碧紗幕其上。播繼以二絕句曰：「二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修。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²⁵

竇群〈重遊惠山寺記〉云：

元和二年五月三日，重遊此寺，獨覽舊題，二十年矣。當時三人，皆登諫列，朱遐景方詣行車，王晦伯尋卒郎署，余自西掖累遷外臺，復此躊躇，吁嗟存歿。朱拾遺詩云：「歲月人間促，煙霞此地多。殷勤竹林寺，更得幾回過。」可謂得詩人之思也。因命題壁，以誌所懷。²⁶

劉禹錫曾在伏毒寺題詩，後來重遊時即有「成篇題舊寺」²⁷。

24 陳允吉：〈論唐代寺廟壁畫對韓愈詩歌的影響〉，《復旦學報》1983年第1期，頁79。

25 王定保：《唐摭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頁73。

26 董誥等編：《全唐文》，卷六一二，頁6185。

27 劉禹錫有〈貞元中侍郎舅氏牧華州時余再忝科第前後由華觀謁陪登伏毒寺屢焉亦曾賦詩題于梁棟今典馮翊暇日登樓南望三峰浩然生思追想昔年之事因成篇題舊寺〉詩，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增訂本）》，卷三五八，頁4042。

唐人不僅題詩於寺院，還在寺院題名。這些題名，或為臺閣名臣，或為一般文人墨客，但當詩人遊於此時，看到他們熟悉的人名，也會怦然心動，依風習賦詩寫感。徐夔〈塔院小屋四壁皆是卿相題名因成四韻〉詩即反映了這一點。詩云：「雁塔攬空映九衢，每看華宇每踟躕。題名盡是台衡跡，滿壁堪為宰輔圖。鸞鳳豈巢荊棘樹，虯龍多蟄帝王都。誰知遠客思歸夢，夜夜無船自過湖。」²⁸這是因看到臺閣重臣的題名而引起的感慨。羅隱詩也說：「野寺疏鐘萬木秋，偶尋題處認名侯」。²⁹白居易的〈吉祥寺見錢侍郎題名〉則是看到友人題名，因而感歎自己的狀況的：「雲雨三年別，風波萬里行。愁來正蕭索，況見古人名。」³⁰

「賈生耽此寺，勝事入詩多」，³¹「一時風景添詩思」，³²唐代寺院空間的景觀形勝，確實為詩人的創作提供了詩材與詩趣，也觸動了詩人的靈感，激發了他們的創作熱情。「官清書府足閒時，曉起攀花折柳枝。九陌城中尋不盡，千峰寺裏看相宜。高人酒味多和藥，自古風光只屬詩。見說往來多靜者，未知前日更逢誰。」³³「千峰寺裏看相宜」與「自古風光只屬詩」兩句，或許可以說明寺院這一特殊空間場所與詩人詩歌創作的關係。³⁴

文學的外部空間與內部空間存在著某種聯繫。盛中唐詩歌的創作緣由、本事、氛圍等外部空間，促進了盛中唐寺院詩歌的格調與風格等內部空間的變化。其一，體現為詩歌中山水禪境的表達。其時，詩人們主動去遊寺訪僧，縱情山水，探奇攬勝，在深林古寺、天高雲淡的景致中尋獲山水之禪悅。他們總是徘徊於自然之間，與山水為友，與草木為伴，「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

28 同上注，卷七〇九，頁 8238。

29 同上注，卷六五六，頁 7600。

30 同上注，卷四四三，頁 4971。

31 同上注，卷七二二，頁 8363。

32 同上注，卷三五九，頁 4066。

33 同上注，卷五〇一，頁 5735-5736。

34 李芳民：〈佛宮南院獨游頻——唐代詩人游居寺院習尚探蹟〉，《文學遺產》2002年第3期，頁 39-49。

而醉。醉則更相枕而臥，臥而夢。意有所極，夢亦同趣。」³⁵ 天邊晚霞、黃昏夕陽、水中明月，在他們的眼中超凡脫俗，享清風，聽松濤，結佛緣，更是使詩人們感受到心靈的愉悅和淡然無欲，這種心境的產生正是得益於寺院山水空間的暢遊與佛禪思想相互促動和契合，而也是受到這種心境的影響，詩歌中具有了追求淡泊寧靜、世外閒散的獨特的禪境表達。

其二，體現詩歌中生活禪趣的展現。中唐之後，詩人在佛禪的影響下，生活中也充滿了禪機。原本以山水意象為主體，變為摹寫日常生活，而禪思，就蘊含在詩人平凡恬淡的日常生活中，寺院作為詩人生活的重要空間場所之一，以之為表現對象的詩歌不乏禪趣。詩歌之禪境，更見閒適之美。

三、寺院氛圍及其他主體對詩人詩藝的提高

佛教寺院空間所具有的公共遊覽場所的性質，使之成為所有信仰與不信仰佛教的人可以共同自由出入之所。於是，喜歡漫遊的詩人常結伴而遊寺；同時，寺院對文人開放為投宿、宴飲之所，多人會宿、徹夜詩酒之集會也常常於其中舉辦。在詩歌創作極為興盛並且是最為慣用的交際手段的唐代，他們在這一場合也常常是遊集必有詩。這既是交流思想、聯絡感情的需要，也是展示才華、切磋詩藝的好機會。

鄭谷〈喜秀上人相訪〉結句與僧人相約「他夜松堂宿，論詩更入微」，³⁶ 這反映了詩人與詩僧之間談論詩道的交遊方式。其實，這一活動並不僅限於士僧之間。唐代以寺院空間為中心所進行的種種文人雅集、士僧酬唱、僧社清會，都對唐代詩歌技藝的發展、提高和創新起到了重要作用。寺院這一空間對詩人創作的特殊意義毋寧表述為：「夜夜僧堂聚，論詩方入微」。

約在天寶二年，王維、王縉、裴迪、王昌齡曾結伴同遊長安青

35 董誥等編：《全唐文》，卷五八一，頁 5870。

36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增訂本）》，卷六七五，頁 7785。

唐人不僅題詩於寺院，還在寺院題名。這些題名，或為臺閣名臣，或為一般文人墨客，但當詩人遊於此時，看到他們熟悉的人名，也會怦然心動，依風習賦詩寫感。徐夔〈塔院小屋四壁皆是卿相題名因成四韻〉詩即反映了這一點。詩云：「雁塔攬空映九衢，每看華宇每踟躕。題名盡是台衡跡，滿壁堪為宰輔圖。鸞鳳豈巢荊棘樹，虯龍多蟄帝王都。誰知遠客思歸夢，夜夜無船自過湖。」²⁸這是因看到臺閣重臣的題名而引起的感慨。羅隱詩也說：「野寺疏鐘萬木秋，偶尋題處認名侯」。²⁹白居易的〈吉祥寺見錢侍郎題名〉則是看到友人題名，因而感歎自己的狀況的：「雲雨三年別，風波萬里行。愁來正蕭索，況見古人名。」³⁰

「賈生耽此寺，勝事入詩多」，³¹「一時風景添詩思」，³²唐代寺院空間的景觀形勝，確實為詩人的創作提供了詩材與詩趣，也觸動了詩人的靈感，激發了他們的創作熱情。「官清書府足閒時，曉起攀花折柳枝。九陌城中尋不盡，千峰寺裏看相宜。高人酒味多和藥，自古風光只屬詩。見說往來多靜者，未知前日更逢誰。」³³「千峰寺裏看相宜」與「自古風光只屬詩」兩句，或許可以說明寺院這一特殊空間場所與詩人詩歌創作的關係。³⁴

文學的外部空間與內部空間存在著某種聯繫。盛中唐詩歌的創作緣由、本事、氛圍等外部空間，促進了盛中唐寺院詩歌的格調與風格等內部空間的變化。其一，體現為詩歌中山水禪境的表達。其時，詩人們主動去遊寺訪僧，縱情山水，探奇攬勝，在深林古寺、天高雲淡的景致中尋獲山水之禪悅。他們總是徘徊於自然之間，與山水為友，與草木為伴，「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

28 同上注，卷七〇九，頁 8238。

29 同上注，卷六五六，頁 7600。

30 同上注，卷四四三，頁 4971。

31 同上注，卷七二二，頁 8363。

32 同上注，卷三五九，頁 4066。

33 同上注，卷五〇一，頁 5735-5736。

34 李芳民：〈佛宮南院獨游頻——唐代詩人游居寺院習尚探蹟〉，《文學遺產》2002年第3期，頁 39-49。

而醉。醉則更相枕而臥，臥而夢。意有所極，夢亦同趣。」³⁵ 天邊晚霞、黃昏夕陽、水中明月，在他們的眼中超凡脫俗，享清風，聽松濤，結佛緣，更是使詩人們感受到心靈的愉悅和淡然無欲，這種心境的產生正是得益於寺院山水空間的暢遊與佛禪思想相互促動和契合，而也是受到這種心境的影響，詩歌中具有了追求淡泊寧靜、世外閒散的獨特的禪境表達。

其二，體現詩歌中生活禪趣的展現。中唐之後，詩人在佛禪的影響下，生活中也充滿了禪機。原本以山水意象為主體，變為摹寫日常生活，而禪思，就蘊含在詩人平凡恬淡的日常生活中，寺院作為詩人生活的重要空間場所之一，以之為表現對象的詩歌不乏禪趣。詩歌之禪境，更見閒適之美。

三、寺院氛圍及其他主體對詩人詩藝的提高

佛教寺院空間所具有的公共遊覽場所的性質，使之成為所有信仰與不信仰佛教的人可以共同自由出入之所。於是，喜歡漫遊的詩人常結伴而遊寺；同時，寺院對文人開放為投宿、宴飲之所，多人會宿、徹夜詩酒之集會也常常於其中舉辦。在詩歌創作極為興盛並且是最為慣用的交際手段的唐代，他們在這一場合也常常是遊集必有詩。這既是交流思想、聯絡感情的需要，也是展示才華、切磋詩藝的好機會。

鄭谷〈喜秀上人相訪〉結句與僧人相約「他夜松堂宿，論詩更入微」，³⁶ 這反映了詩人與詩僧之間談論詩道的交遊方式。其實，這一活動並不僅限於士僧之間。唐代以寺院空間為中心所進行的種種文人雅集、士僧酬唱、僧社清會，都對唐代詩歌技藝的發展、提高和創新起到了重要作用。寺院這一空間對詩人創作的特殊意義毋寧表述為：「夜夜僧堂聚，論詩方入微」。

約在天寶二年，王維、王縉、裴迪、王昌齡曾結伴同遊長安青

35 董誥等編：《全唐文》，卷五八一，頁 5870。

36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增訂本）》，卷六七五，頁 7785。

龍寺，一同吟詠賦詩，並囑王維作〈青龍寺曇壁上人兄院集並序〉記其事。王維序末云：「時江寧大兄持片石，命維序之。詩五韻，座上成。」³⁷ 可見這是一個限定篇制並比試才之遲速的吟詠。而劉長卿的〈清明日青龍寺上方得多字〉、耿湣的〈晚秋宿裴員外寺院得逢字〉等詩，則表明是寺院集會時的限韻之作。另有同遊諸人就寺內風物分題而賦的作品，如李頎〈擘公院各賦一物得初荷〉，是李頎與友人在長壽寺內分題詠物之作，岑參〈臨洮龍興寺玄上人院同詠青木香叢〉、劉禹錫〈楚州開元寺北院枸杞臨井繁茂可觀羣賢賦詩因以繼和〉則是多人同詠一物，其中才藝較量的意味十分濃厚。更為人所熟知的是，天寶十二載前後，杜甫、高適、岑參、薛據、儲光羲在慈恩寺登塔共賦，留下了一段詩壇佳話。這一次詩壇文人的相會以及他們的同題共賦，成為後人所津津樂道的話題，並為後代詩評家裁量風雅、月旦詩藝提供了素材。五人所作之詩，除薛據詩無存，其他人的作品都流傳了下來。如仇兆鰲即云：

同時諸公登塔，各有題詠。薛據詩已失傳；岑、儲兩作，風秀熨貼，不愧名家；高達夫出之簡淨，品格亦自清堅。少陵則格法嚴整，氣象崢嶸，音節悲壯，而俯仰高深之景，盱衡今古之識，感慨身世之懷，莫不曲盡篇中，真足壓倒羣賢，雄視千古矣。三家結語，未免拘束，致鮮後勁。杜於末幅，另開眼界，獨闢思議，力量百倍於人。³⁸

詩人在這種場合的創作，確是他們交流詩藝的好機會。唐德宗貞元四年八月，詩人朱暹自長安還吳，在無錫邀友人王武陵、竇群同宿惠山寺，賦詩題壁。三人均有〈宿惠山寺〉詩傳世。王武陵詩序云：

戊辰秋八月，吳郡朱暹景自秦還吳，南次無錫，命余及故人竇丹列會於惠山之精舍。是時山林始秋，高興在

37 同上注，卷一二七，頁1289-1290。

38 仇兆鰲：《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106。

木，涼風白雲，起於座隅。逍遙於長松之下，偃息於盤石之上。仰視雲嶺，俯瞰寒泉。夕陽西歸，皓月東出。羣動皆息，視身如空。立言妙論，以極窮奧。丹列有遁世之志，遐景有塵外之心。余亦樂天知命，怡然契合，視富貴如浮雲，一歌一詠，以紓情性。夫良辰嘉會，古人所惜。序述不作，是闕文也。山林之下，景物秀茂。賦詩道意，以紀方外之遊。³⁹

山林之下、良辰嘉會，視身如空，便可專注於一歌一詠，抒發性情之外，與詩藝細處相與推敲自是應有之義。唐代詩人的類似活動很多，如王昌齡有〈諸官遊招隱寺〉、劉長卿有〈集梁耿開元寺所居〉、嚴維有〈秋日與諸公文會天口寺〉等等，茲不具列。為何這類活動多於寺院空間之中舉辦，抑或是寺院空間何以能引起詩人才藝比較的慾望？對此，權德輿記友人在天長寺酬唱時道：

《易》之《同人》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故道同於內，而氣相求；情發於中，而聲成文。以觀以羣，以比以興。……外煩埃壒，中孕閑曠，晝懸清光，夕湛虛明。上方之鍾磬，深夜之月露，眺聽寂寞，情靈感發。投者報者，無非瓊瑤，如金絲應和，孔雀翔集，盡在是矣。⁴⁰

正是因為處身於寺院這種特定的空間環境，詩人們情靈感發，才有了相互酬唱、切磋詩藝的願望。

有時在這一空間場所，詩人們還會與舊友不期而遇，溫庭筠〈和友人磐石寺逢舊友〉詩即是寫友人在寺院邂逅逢舊，因而自己創作唱酬詩歌的，這當然也同樣提供了交流詩藝的機會。有時不相互熟悉的詩人在寺院相遇，也會相互切磋詩藝。《唐摭言》就有這樣的記載，云：

39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增訂本）》，卷二七五，頁3117。

40 董誥等編：《全唐文》，卷四九〇，頁5004。

龍寺，一同吟詠賦詩，並囑王維作〈青龍寺曇壁上人兄院集並序〉記其事。王維序末云：「時江寧大兄持片石，命維序之。詩五韻，座上成。」³⁷ 可見這是一個限定篇制並比試才之遲速的吟詠。而劉長卿的〈清明日青龍寺上方得多字〉、耿湣的〈晚秋宿裴員外寺院得逢字〉等詩，則表明是寺院集會時的限韻之作。另有同遊諸人就寺內風物分題而賦的作品，如李頎〈粲公院各賦一物得初荷〉，是李頎與友人在長壽寺內分題詠物之作，岑參〈臨洮龍興寺玄上人院同詠青木香叢〉、劉禹錫〈楚州開元寺北院枸杞臨井繁茂可觀羣賢賦詩因以繼和〉則是多人同詠一物，其中才藝較量的意味十分濃厚。更為人所熟知的是，天寶十二載前後，杜甫、高適、岑參、薛據、儲光羲在慈恩寺登塔共賦，留下了一段詩壇佳話。這一次詩壇文人的相會以及他們的同題共賦，成為後人所津津樂道的話題，並為後代詩評家裁量風雅、月旦詩藝提供了素材。五人所作之詩，除薛據詩無存，其他人的作品都流傳了下來。如仇兆鰲即云：

同時諸公登塔，各有題詠。薛據詩已失傳；岑、儲兩作，風秀熨貼，不愧名家；高達夫出之簡淨，品格亦自清堅。少陵則格法嚴整，氣象崢嶸，音節悲壯，而俯仰高深之景，盱衡今古之識，感慨身世之懷，莫不曲盡篇中，真足壓倒羣賢，雄視千古矣。三家結語，未免拘束，致鮮後勁。杜於末幅，另開眼界，獨闢思議，力量百倍於人。³⁸

詩人在這種場合的創作，確是他們交流詩藝的好機會。唐德宗貞元四年八月，詩人朱宿自長安還吳，在無錫邀友人王武陵、竇群同宿惠山寺，賦詩題壁。三人均有〈宿惠山寺〉詩傳世。王武陵詩序云：

戊辰秋八月，吳郡朱遐景自秦還吳，南次無錫，命余及故人竇丹列會於惠山之精舍。是時山林始秋，高興在

37 同上注，卷一二七，頁1289-1290。

38 仇兆鰲：《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106。

木，涼風白雲，起於座隅。逍遙於長松之下，偃息於盤石之上。仰視雲嶺，俯瞰寒泉。夕陽西歸，皓月東出。羣動皆息，視身如空。立言妙論，以極窮奧。丹列有遁世之志，遐景有塵外之心。余亦樂天知命，怡然契合，視富貴如浮雲，一歌一詠，以紓情性。夫良辰嘉會，古人所惜。序述不作，是闕文也。山林之下，景物秀茂。賦詩道意，以紀方外之遊。³⁹

山林之下、良辰嘉會，視身如空，便可專注於一歌一詠，抒發性情之外，與詩藝細處相與推敲自是應有之義。唐代詩人的類似活動很多，如王昌齡有〈諸官遊招隱寺〉、劉長卿有〈集梁耿開元寺所居〉、嚴維有〈秋日與諸公文會天口寺〉等等，茲不具列。為何這類活動多於寺院空間之中舉辦，抑或是寺院空間何以能引起詩人才藝比較的慾望？對此，權德輿記友人在天長寺酬唱時道：

《易》之《同人》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故道同於內，而氣相求；情發於中，而聲成文。以觀以羣，以比以興。……外煩埃壒，中孕閑曠，晝懸清光，夕湛虛明。上方之鍾磬，深夜之月露，眺聽寂寞，情靈感發。投者報者，無非瓊瑤，如金絲應和，孔雀翔集，盡在是矣。⁴⁰

正是因為處身於寺院這種特定的空間環境，詩人們情靈感發，才有了相互酬唱、切磋詩藝的願望。

有時在這一空間場所，詩人們還會與舊友不期而遇，溫庭筠〈和友人磐石寺逢舊友〉詩即是寫友人在寺院邂逅逢舊，因而自己創作唱酬詩歌的，這當然也同樣提供了交流詩藝的機會。有時不相互熟悉的詩人在寺院相遇，也會相互切磋詩藝。《唐摭言》就有這樣的記載，云：

39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增訂本）》，卷二七五，頁 3117。

40 董誥等編：《全唐文》，卷四九〇，頁 5004。

湖南日試萬言王璘，與李羣玉校書相遇於嶽麓寺。羣玉揖之曰：「公何許人？」璘曰：「日試萬言王璘。」羣玉待之甚淺，曰：「請與公聯句可乎？」璘曰：「唯子之命。」羣玉因破題而授之，璘覽之略不佇思，而繼之曰：「芍藥花開菩薩面，欄葉散野叉頭。」羣玉知之，訊之他事矣。⁴¹

這種寺院之內逞才顯能的行為，應是以寺院為詩藝競技場這一社會氛圍的客觀反映，此為寺院提高詩人詩藝之一端。其另一端，則是活動於寺院之中的寺僧所帶來的新變。其具體途徑，便是通過文人與寺僧在寺院內的雅集酬唱，包括結僧社和以詩僧為中心的詩會等形式。

儒釋交流，詩文酬唱，約起於東晉，其中後世有「蓮社」之稱的慧遠與劉遺民、雷次宗、周續之等百二十人的結社堪稱經典。蓮社雖是一個宗教團體，但其成員卻包容僧、俗兩道，從而對後來儒、釋交流風尚的流行與發展影響深遠，特別是其不廢文詠與重現山水審美的趣味，對後代文人的以文會友、結社雅集，影響尤大。唐代崇佛的官僚士大夫和在家居士同僧人結成的僧社，其具體情況不可詳考，只能從詩歌之中窺其一斑。

張祜〈題蘇州思益寺〉詩云：「會當來結社，長日為僧吟」，⁴²戴叔倫〈與友人過山寺〉詩曰：「談詩訪靈徹，入社愧陶公」，⁴³均可見僧社中作詩風氣之濃。風氣所及，當唐代詩人往返於釋門，流連於寺院之際，由蓮社等所積澱的風流雅尚便不能不泛起於心頭，這在唐人的詩歌之中表現得很清楚。張登〈招客遊寺〉云：「江城吏散卷春陰，山寺鳴鐘隔雨深。招取遺民赴僧社，竹堂分坐靜看心。」⁴⁴朱灣〈過宣上人湖上蘭若〉亦有句云：「十年湖上結幽期，偏向東林遇遠師。未道姓名童子識，不酬言語上人知。」⁴⁵李咸用

41 王定保：《唐摭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頁149-150。

42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增訂本）》，卷五一〇，頁5858。

43 同上注，卷二七三，頁3072。

44 同上注，卷三一三，頁3527。

45 同上注，卷三〇六，第3477。

的〈和彭進士秋日遊靖居山寺〉末聯也寫道：「自笑未曾同逸步，終非宗炳社中人。」⁴⁶此外，溫庭筠〈贈越僧岳雲二首〉其一也說：「世機消已盡，巾屨亦飄然。一室故山月，滿瓶秋澗泉。禪庵過微雪，鄉寺隔寒煙。應共白蓮客，相期松桂前。」⁴⁷僧社的這種以詩歌創作為主要活動的組織方式，必然對與社諸人詩藝的交流和提高有莫大助益。

由於詩歌創作在全社會的風行，能詩的緇流在唐代的數量也較南北朝時大大增加，並出現了詩僧這一獨特稱謂。《唐才子傳》在談到這一點時曾云：

自齊梁以來，方外工文者，如支遁、道暉、惠休、寶月之儔，馳驟文苑，沉淫藻思，奇章偉什，綺錯星陳，不為寡矣。厥後喪亂，兵革相尋，緇素亦已狼藉，罕有復入其流者。至唐累朝，雅道大振，古風再作，率皆崇衷像教，駐念津梁，龍象相望，金碧交映。雖寂寥之山河，實威儀之淵藪。寵光優渥，無逾此時。故有顛頓文場之人，憔悴江海之客，往往裂冠裳，撥增繳，杳然高邁，雲集蕭齋，一食自甘，方袍便足，靈臺澄皎，無事相干，三餘有簡牘之期，六時分吟諷之隙。青峰瞰門，綠水周舍，長廊步履，幽徑尋真，景變序遷，蕩入冥思。凡此數者，皆達人雅士，夙所欽懷，雖則心侔跡殊，所趣無間。會稽傳孫、許之玄談，廬阜接謝、陶於白社，宜其日鍛月鍊，志彌厲而道彌精。佳句縱橫，不廢禪定，巖穴相邇，更唱迭酬，苦於三峽猿，清同九皋鶴，不其偉歟！⁴⁸

精於詩歌創作的詩僧的湧現，不僅使得唐代詩人的詩歌中增添了對前代僧徒與文人交往而生出的風雅與韻致，同時也進一步影響到了

46 同上注，卷六四六，頁 7461。

47 同上注，卷五八一，頁 6796。

48 傅璇琮：《唐才子傳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一冊，頁 533。

湖南日試萬言王璘，與李羣玉校書相遇於嶽麓寺。羣玉揖之曰：「公何許人？」璘曰：「日試萬言王璘。」羣玉待之甚淺，曰：「請與公聯句可乎？」璘曰：「唯子之命。」羣玉因破題而授之，璘覽之略不佇思，而繼之曰：「芍藥花開菩薩面，欄葉散野叉頭。」羣玉知之，訊之他事矣。⁴¹

這種寺院之內逞才顯能的行為，應是以寺院為詩藝競技場這一社會氛圍的客觀反映，此為寺院提高詩人詩藝之一端。其另一端，則是活動於寺院之中的寺僧所帶來的新變。其具體途徑，便是通過文人與寺僧在寺院內的雅集酬唱，包括結僧社和以詩僧為中心的詩會等形式。

儒釋交流，詩文酬唱，約起於東晉，其中後世有「蓮社」之稱的慧遠與劉遺民、雷次宗、周續之等百二十人的結社堪稱經典。蓮社雖是一個宗教團體，但其成員卻包容僧、俗兩道，從而對後來儒、釋交流風尚的流行與發展影響深遠，特別是其不廢文詠與重現山水審美的趣味，對後代文人的以文會友、結社雅集，影響尤大。唐代崇佛的官僚士大夫和在家居士同僧人結成的僧社，其具體情況不可詳考，只能從詩歌之中窺其一斑。

張祜〈題蘇州思益寺〉詩云：「會當來結社，長日為僧吟」，⁴²戴叔倫〈與友人過山寺〉詩曰：「談詩訪靈徹，入社愧陶公」，⁴³均可見僧社中作詩風氣之濃。風氣所及，當唐代詩人往返於釋門，流連於寺院之際，由蓮社等所積澱的風流雅尚便不能不泛起於心頭，這在唐人的詩歌之中表現得很清楚。張登〈招客遊寺〉云：「江城吏散卷春陰，山寺鳴鐘隔雨深。招取遺民赴僧社，竹堂分坐靜看心。」⁴⁴朱灣〈過宣上人湖上蘭若〉亦有句云：「十年湖上結幽期，偏向東林遇遠師。未道姓名童子識，不酬言語上人知。」⁴⁵李咸用

41 王定保：《唐摭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頁149-150。

42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增訂本）》，卷五一〇，頁5858。

43 同上注，卷二七三，頁3072。

44 同上注，卷三一三，頁3527。

45 同上注，卷三〇六，第3477。

的〈和彭進士秋日遊靖居山寺〉末聯也寫道：「自笑未曾同逸步，終非宗炳社中人。」⁴⁶此外，溫庭筠〈贈越僧岳雲二首〉其一也說：「世機消已盡，巾屨亦飄然。一室故山月，滿瓶秋澗泉。禪庵過微雪，鄉寺隔寒煙。應共白蓮客，相期松桂前。」⁴⁷僧社的這種以詩歌創作為主要活動的組織方式，必然對與社諸人詩藝的交流和提高有莫大助益。

由於詩歌創作在全社會的風行，能詩的緇流在唐代的數量也較南北朝時大大增加，並出現了詩僧這一獨特稱謂。《唐才子傳》在談到這一點時曾云：

自齊梁以來，方外工文者，如支遁、道暉、惠休、寶月之儔，馳驟文苑，沉淫藻思，奇章偉什，綺錯星陳，不為寡矣。厥後喪亂，兵革相尋，緇素亦已狼藉，罕有復入其流者。至唐累朝，雅道大振，古風再作，率皆崇衷像教，駐念津梁，龍象相望，金碧交映。雖寂寥之山河，實威儀之淵藪。寵光優渥，無逾此時。故有顛頓文場之人，憔悴江海之客，往往裂冠裳，撥增繳，杳然高邁，雲集蕭齋，一食自甘，方袍便足，靈臺澄皎，無事相干，三餘有簡牘之期，六時分吟諷之隙。青峰瞰門，綠水周舍，長廊步履，幽徑尋真，景變序遷，蕩入冥思。凡此數者，皆達人雅士，夙所欽懷，雖則心侔跡殊，所趣無間。會稽傳孫、許之玄談，廬阜接謝、陶於白社，宜其日鍛月鍊，志彌厲而道彌精。佳句縱橫，不廢禪定，巖穴相邇，更唱迭酬，苦於三峽猿，清同九皋鶴，不其偉歟！⁴⁸

精於詩歌創作的詩僧的湧現，不僅使得唐代詩人的詩歌中增添了對前代僧徒與文人交往而生出的風雅與韻致，同時也進一步影響到了

46 同上注，卷六四六，頁 7461。

47 同上注，卷五八一，頁 6796。

48 傅璇琮：《唐才子傳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一冊，頁 533。

他們的詩歌創作活動。詩僧的身份身份是雙重的，一方面他們是宗教徒，其活動範圍大都以寺院為中心；另一方面他們又擅長詩道，與詩人在創作上有著共同的語言。因此，他們活動的場所也就吸引了詩人，從而以寺院空間為中心，在某種程度上就帶來了詩人詩歌創作活動的活躍。特別是中唐以後，隨著江南詩僧的崛起，其對詩人創作的正面影響就更為突出，如道標、皎然、靈一、廣宣、棲白、齊己、尚彥、貫休等。這一群活躍於江南的詩僧，與眾多的詩人都有交往。

靈一，「居若耶溪雲門寺，從學者四方而至矣」，又「與皇甫昆季、嚴少府、朱山人、徹上人等為詩友，酬贈甚多。刻意聲調，苦心不倦，騁譽叢林」。⁴⁹ 皎然的詩，「江南詞人，莫不楷範。極於緣情綺靡，故辭多芳澤；師古興制，故律尚清壯」。⁵⁰ 也許是長期的蒲團生涯培養了他們沉靜穎悟的能力，寧靜的寺院環境滋長了他們對動靜變化的敏銳感受，因而他們的詩歌對於清淨之境、禪玄之理的表現就別見會心。這也就特別吸引了一些詩人與之進行交流。也許處於這一原因，寺院的詩會唱和在江南就較為突出，其中皎然等在湖州寺院的唱和活動，堪為釋子與詩人互相切磋的典範。

大曆時期，浙西湖州詩會是中唐時期最有影響的詩會之一。皎然對詩歌創作有自己的見解，在〈秋日遙和盧使君遊何山寺宿敝上人房論涅槃經義〉中曾提到「詩情緣境發，法性寄筌空」，⁵¹〈答俞校書冬夜〉中提到「詩情聊作用，空性惟寂靜」。⁵² 因此，在他與諸人唱和時，他對詩歌創作的意見可能就會對文士產生不自覺的影響，起碼在以詩境表現禪境方面。皎然除了與諸文士唱和外，在寺院空間中進行有組合的聯句，也是交流詩歌創作的重要形式。在唐代，聯句這種詩歌創作形式，到了中唐以後，才多為詩人所用。《全唐詩》卷七八八至七九四所收之聯句，大都是中晚唐作品。而聯句這

49 同上注，頁 530-532。

50 董誥等編：《全唐文》，卷五四四，頁 5520。

51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增訂本）》，卷八一五，頁 9257。

52 同上注，頁 9173。

種創作形式的大量運用則是從浙西湖州詩會開始的。在詩會聯句創作中，皎然是一個十分活躍的人物，《全唐詩》卷七九四皎然（清晝）下的聯句共 29 首。

除皎然組織聯句唱和活動之外，詩僧廣宣也是一個核心人物。如李益有〈宣上人病中相尋聯句〉、〈重陽夜集蘭陵居與宣上人聯句〉、〈蘭陵僻居聯句〉等。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沒有詩僧的參與，唐代的唱和活動也多於寺院之中舉辦。這裡想說明的是，由於眾多的聯唱活動有皎然、廣宣這樣的詩僧的參與，且很多都是在寺院舉行的，那麼，詩僧與詩人在寺院這一特定處所「磨練寫作技巧」，就顯示了寺院空間在詩人創作中的特別意義。⁵³

唐代寺院空間不僅能夠激發詩人的創作興致，詩人同遊、會聚寺院時，這裡又成了詩藝交流、比賽競技之所；而詩僧的介入更加強化了寺院的這一功能。僧社、聯唱等活動每每於寺院中舉行。這些圍繞寺院這一空間環境展開的活動都對唐代詩人藝術技巧的磨練與提高具有積極意義。

四、結語

本文選擇了文學空間這樣一個視角，以盛中唐時期寺院空間文學為主要對象，以期使論述較為具體，而又能把握其整體性，注意其發展演變的聯繫性，做出一些初步嘗試。需要說明的是，文學空間的明顯優點是，一個相對獨立空間的文學文化傳統和地方特色，確實可以持久而廣泛地影響這裡文士的思想、性格、情調，進而影響其文學的主要風貌。

唐代僧人和文士關係極為密切，交往也非常頻繁，其中很多作品也產生在寺院這一空間範圍內。隨著寺、僧交往的深入，無論是在橫向的涉獵內容上，還是在縱向的主題開掘上，皆對唐代詩歌產生了啟迪作用，從而使不同的創作群體形成了風格迥異的詩歌流派。詩人在寺院文學空間下對遊寺、寓寺、唱和、惜別等活動的書

53 李芳民：〈唐代佛教寺院文化與詩歌創作〉，《文史哲》2005 年第 5 期，頁 97-103。

他們的詩歌創作活動。詩僧的身份身份是雙重的，一方面他們是宗教徒，其活動範圍大都以寺院為中心；另一方面他們又擅長詩道，與詩人在創作上有著共同的語言。因此，他們活動的場所也就吸引了詩人，從而以寺院空間為中心，在某種程度上就帶來了詩人詩歌創作活動的活躍。特別是中唐以後，隨著江南詩僧的崛起，其對詩人創作的正面影響就更為突出，如道標、皎然、靈一、廣宣、棲白、齊己、尚彥、貫休等。這一群活躍於江南的詩僧，與眾多的詩人都有交往。

靈一，「居若耶溪雲門寺，從學者四方而至矣」，又「與皇甫昆季、嚴少府、朱山人、徹上人等為詩友，酬贈甚多。刻意聲調，苦心不倦，騁譽叢林」。⁴⁹ 皎然的詩，「江南詞人，莫不楷範。極於緣情綺靡，故辭多芳澤；師古興制，故律尚清壯」。⁵⁰ 也許是長期的蒲團生涯培養了他們沉靜穎悟的能力，寧靜的寺院環境滋長了他們對動靜變化的敏銳感受，因而他們的詩歌對於清淨之境、禪玄之理的表現就別見會心。這也就特別吸引了一些詩人與之進行交流。也許處於這一原因，寺院的詩會唱和在江南就較為突出，其中皎然等在湖州寺院的唱和活動，堪為釋子與詩人互相切磋的典範。

大曆時期，浙西湖州詩會是中唐時期最有影響的詩會之一。皎然對詩歌創作有自己的見解，在〈秋日遙和盧使君遊何山寺宿敬上人房論涅槃經義〉中曾提到「詩情緣境發，法性寄筌空」，⁵¹〈答俞校書冬夜〉中提到「詩情聊作用，空性惟寂靜」。⁵² 因此，在他與諸人唱和時，他對詩歌創作的意見可能就會對文士產生不自覺的影響，起碼在以詩境表現禪境方面。皎然除了與諸文士唱和外，在寺院空間中進行有組合的聯句，也是交流詩歌創作的重要形式。在唐代，聯句這種詩歌創作形式，到了中唐以後，才多為詩人所用。《全唐詩》卷七八八至七九四所收之聯句，大都是中晚唐作品。而聯句這

49 同上注，頁 530-532。

50 董誥等編：《全唐文》，卷五四四，頁 5520。

51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增訂本）》，卷八一五，頁 9257。

52 同上注，頁 9173。

種創作形式的大量運用則是從浙西湖州詩會開始的。在詩會聯句創作中，皎然是一個十分活躍的人物，《全唐詩》卷七九四皎然（清晝）下的聯句共 29 首。

除皎然組織聯句唱和活動之外，詩僧廣宣也是一個核心人物。如李益有〈宣上人病中相尋聯句〉、〈重陽夜集蘭陵居與宣上人聯句〉、〈蘭陵僻居聯句〉等。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沒有詩僧的參與，唐代的唱和活動也多於寺院之中舉辦。這裡想說明的是，由於眾多的聯唱活動有皎然、廣宣這樣的詩僧的參與，且很多都是在寺院舉行的，那麼，詩僧與詩人在寺院這一特定處所「磨練寫作技巧」，就顯示了寺院空間在詩人創作中的特別意義。⁵³

唐代寺院空間不僅能夠激發詩人的創作興致，詩人同遊、會聚寺院時，這裡又成了詩藝交流、比賽競技之所；而詩僧的介入更加強化了寺院的這一功能。僧社、聯唱等活動每每於寺院中舉行。這些圍繞寺院這一空間環境展開的活動都對唐代詩人藝術技巧的磨練與提高具有積極意義。

四、結語

本文選擇了文學空間這樣一個視角，以盛中唐時期寺院空間文學為主要對象，以期使論述較為具體，而又能把握其整體性，注意其發展演變的聯繫性，做出一些初步嘗試。需要說明的是，文學空間的明顯優點是，一個相對獨立空間的文學文化傳統和地方特色，確實可以持久而廣泛地影響這裡文士的思想、性格、情調，進而影響其文學的主要風貌。

唐代僧人和文士關係極為密切，交往也非常頻繁，其中很多作品也產生在寺院這一空間範圍內。隨著寺、僧交往的深入，無論是在橫向的涉獵內容上，還是在縱向的主題開掘上，皆對唐代詩歌產生了啟迪作用，從而使不同的創作群體形成了風格迥異的詩歌流派。詩人在寺院文學空間下對遊寺、寓寺、唱和、惜別等活動的書

53 李芳民：〈唐代佛教寺院文化與詩歌創作〉，《文史哲》2005 年第 5 期，頁 97-103。

寫形成了卓有特色的詩歌類型，擴展了盛中唐詩歌的題材範式。寺院這一文學空間為文士的創作提供了動力，也深刻影響了其文學作品的內涵和風貌，可以說，盛唐詩歌興趣的形成和中唐詩歌情趣的發展，寺院這一文學空間給予的助力甚多。寺院文學空間以玲瓏意象所帶來的空靈之美，世外隱逸所帶來的閒逸之美以及放任幽緒所帶來的疏野之美等方面，影響了盛中唐詩歌的審美取向和藝術風格，並為晚唐皎然、司空圖自然詩論的形成，提供了創作的積澱和理論的啟發。

引用書目

- 愛新覺羅·弘曆：《御選唐宋詩醇》。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448 冊，頁 1-940。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
- 陳尚君編：《全唐詩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
- 陳允吉：〈論唐代寺廟壁畫對韓愈詩歌的影響〉。《復旦學報》1983 年第 1 期，頁 72-80。
- 戴偉華：《地域文化與唐代詩歌》。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 道宣：《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40 冊，頁 1-156。東京：大正新修大藏經刊行會，1988 年。
- 丁福保：《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
- 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
- 段玉明：《中國寺廟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
- 傅璇琮：《唐才子傳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 胡可先：《唐詩發展的地域因緣和空間形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年。
- 賈晉華：《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群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年。
-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Oxford: Blackwell, 1991.
- 李斌城：〈論唐代士大夫與佛教〉。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魏晉隋唐史論集》第二輯，頁 316-349。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3 年。
- 李芳民：〈佛宮南院獨游頻——唐代詩人游居寺院習尚探蹟〉。《文學遺產》2002 年第 3 期，頁 39-49。
- ：〈唐代佛教寺院文化與詩歌創作〉。《文史哲》2005 年第 5 期，頁 97-103。
- ：《唐五代佛寺輯考》。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年。
- ：〈唐人小說中佛寺的藝術功能與文化蘊涵〉。《山西大學學報

寫形成了卓有特色的詩歌類型，擴展了盛中唐詩歌的題材範式。寺院這一文學空間為文士的創作提供了動力，也深刻影響了其文學作品的內涵和風貌，可以說，盛唐詩歌興趣的形成和中唐詩歌情趣的發展，寺院這一文學空間給予的助力甚多。寺院文學空間以玲瓏意象所帶來的空靈之美，世外隱逸所帶來的閒逸之美以及放任幽緒所帶來的疏野之美等方面，影響了盛中唐詩歌的審美取向和藝術風格，並為晚唐皎然、司空圖自然詩論的形成，提供了創作的積澱和理論的啟發。

引用書目

- 愛新覺羅·弘曆：《御選唐宋詩醇》。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448 冊，頁 1-940。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
- 陳尚君編：《全唐詩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
- 陳允吉：〈論唐代寺廟壁畫對韓愈詩歌的影響〉。《復旦學報》1983 年第 1 期，頁 72-80。
- 戴偉華：《地域文化與唐代詩歌》。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 道宣：《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40 冊，頁 1-156。東京：大正新修大藏經刊行會，1988 年。
- 丁福保：《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
- 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
- 段玉明：《中國寺廟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
- 傅璇琮：《唐才子傳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 胡可先：《唐詩發展的地域因緣和空間形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年。
- 賈晉華：《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群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年。
-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Oxford: Blackwell, 1991.
- 李斌城：〈論唐代士大夫與佛教〉。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魏晉隋唐史論集》第二輯，頁 316-349。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3 年。
- 李芳民：〈佛宮南院獨游頻——唐代詩人游居寺院習尚探蹟〉。《文學遺產》2002 年第 3 期，頁 39-49。
- ：〈唐代佛教寺院文化與詩歌創作〉。《文史哲》2005 年第 5 期，頁 97-103。
- ：《唐五代佛寺輯考》。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年。
- ：〈唐人小說中佛寺的藝術功能與文化蘊涵〉。《山西大學學報

- (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1期,頁83-90。
- 李孝聰主編:《唐代地域結構與運作空間》。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
- 劉洪生:《唐代題壁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
- 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
- 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 梅新林:〈文學地理學:基於「空間」之維的理論建構〉。《浙江社會科學》2015年第3期,頁122-136。
- 宇文所安(Owen, Stephen)著,陳引馳、陳磊譯,田曉菲校:《中國「中世紀」的終結:中唐文學文化論集》。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
-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 仇兆鰲:《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沈玉成等編:《中國歷代僧詩全集·晉唐五代卷》。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
- 孫昌武:〈唐長安佛寺考〉。《唐研究》第二卷,頁1-49。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
- 索亞(Soja, Edward W.)著,陸揚譯:《第三空間:去往洛杉磯和其他真實和想像地方的旅程》。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
- 王定保:《唐摭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 王啟興:〈寺院文化與唐代詩人〉。《唐代文學研究》第三輯,頁91-104。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
- 嚴耕望:〈唐人習業山林寺院之風尚〉。《嚴耕望史學論文集》,頁886-93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 俞陛雲:《詩境淺說》。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
- 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 查屏球:《唐學與唐詩——中晚唐詩風的一種文化考察》。北京:商

務印書館，2000年。

張弓：《漢唐佛寺文化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

鍾嶸著，曹旭集注：《詩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周祖譔主編：《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唐五代卷》。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 （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1期，頁83-90。
- 李孝聰主編：《唐代地域結構與運作空間》。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
- 劉洪生：《唐代題壁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
- 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
- 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 梅新林：〈文學地理學：基於「空間」之維的理論建構〉。《浙江社會科學》2015年第3期，頁122-136。
- 宇文所安（Owen, Stephen）著，陳引馳、陳磊譯，田曉菲校：《中國「中世紀」的終結：中唐文學文化論集》。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
-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 仇兆鰲：《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沈玉成等編：《中國歷代僧詩全集·晉唐五代卷》。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
- 孫昌武：〈唐長安佛寺考〉。《唐研究》第二卷，頁1-49。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
- 索亞（Soja, Edward W.）著，陸揚譯：《第三空間：去往洛杉磯和其他真實和想像地方的旅程》。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
- 王定保：《唐摭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 王啟興：〈寺院文化與唐代詩人〉。《唐代文學研究》第三輯，頁91-104。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
- 嚴耕望：〈唐人習業山林寺院之風尚〉。《嚴耕望史學論文集》，頁886-93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 俞陛雲：《詩境淺說》。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
- 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 查屏球：《唐學與唐詩——中晚唐詩風的一種文化考察》。北京：商

務印書館，2000年。

張弓：《漢唐佛寺文化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

鍾嶸著，曹旭集注：《詩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周祖譔主編：《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唐五代卷》。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Poetry Creation of Monasteries in the Mid-Ta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Space

WANG Xueting

Jao Tsung-I Academy of Sinology,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While literary space is a product created and developed by literati, it simultaneously serves as vehicle that in turn influences and shapes their lives and literary works. Within the diverse and organic literary space offered by the temples of the Tang dynasty, interest in the creation of poetry flourished. Temples served as a platform for social interaction and provided unique spaces for insightful contemplation. The environment of temples in mountain forests thus fulfilled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needs of these scholars. The special environment of these temples, including their natural landscape, cultural landscape, the entire Buddhist culture embodied by the residing scholar monks provided poets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create their works. Experiencing monastic life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poets' writing an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ir craft.

Keywords: Literary space, monastic life, Mid-Tang Dynasty, poetry writing